



思政教育要在『知、情、意、行』上下功夫

□ 罗宗毅

么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什么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让学生能够“知其然”。

二要讲清楚“为什么”。例如，在当下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中，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让学生在“知其然”的基础上能够“知其所以然”，促进其由理论上的清醒达到政治上的坚定。在这一环节，要求教师要善于用理论解析政治、说明政治、支撑政治。

三要讲清楚“如何做”，让学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在这一环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和学员一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但不能就事论事，局限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是要就事论理，重在把经典作家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或各学科研究问题的学术框架交给学生，使其能够举一反三，把所学到的方法运用到解决其他类似问题中去。

第二，动之以情，以情感人。人的情感是在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情感形成后又会认知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强化作用。古人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情到理方至，情阻理难通”等。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依靠逻辑的力量传授知识真理，还要用情感的力量去征服和感化学生的心灵，引起教育对象的内心触动，达到以情感人、以情化人、以情育人的目的。

动之以情强调发挥情感心理的“催化剂”作用，重点解决由理性认同到情感认同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力。

一是以事感人。比如，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形象直观的事例、数据、图片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让教育对象在“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情况下激发起情感的共鸣，增进情感认同。

二是以史感人。通过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强化红色记忆，增进情感认同。

三是有人感人。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先进典型、道德楷模、最美人物、感动中国人物等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了可敬、可亲、可信、可学的鲜活榜样。可通过发挥其示范激励作用增进情感认同。

四是以情促情。教育者要通过自己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和高尚人格感染受教育者，实现情感与情感的共鸣，促进人们情感认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

第三，导之以行，培养行为。行是知的目的，提高认知的目的在于指导行动，做到“知行合一”。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包含理论知识的接收、内化、转化三个环节，即将所学习的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知识转化为德性，使德性转化为德行。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把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和道德规范教育与道德行为的实际锻炼和训练结合起来，在讲清道理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和组织学生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以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第四，持之以恒，锻炼意志。意志是人们按照道德原则和要求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时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有了坚强的意志，才会有主心骨，有思想道德和政治定力，不轻易屈从于外来压力，不人云亦云。锻炼意志、培养定力需要学生经风雨见世面，是一个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的长期磨炼过程。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注重启发性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让学生在教师的正确指导下自主地作出判断和选择，发挥主体性作用，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央党校教育长）



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州守韩朴为祭祀朱熹，在歙县城南门外，望紫阳山方向，建立书院，理宗钦赐御书“紫阳书院”。这是徽州首个缘于朱熹建立的书院，也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祭祀朱熹的书院。自创建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制，徽州紫阳书院数次迁徙，历经岁月沉淀，见证了古徽州 600 余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

守正创新

以紫阳书院为代表的徽州书院与徽州学术的发展血肉相连，书院因学术传播而繁荣兴盛，徽州学术因书院的推动而传承创新。

宋理宗后，朱子学取得正统地位。因为朱熹与婺源的血脉联系，“文公归里，乡先生受正学者甚众”，徽州学人成为朱子之学的重要继承者与传播者。宋末至明初，新安理学家纷纷创办或主持书院，潜心朱子之学，传播朱子思想，一时间“师友渊源，后先辉映，如霞蔚云蒸”。随着唐桂芳、曹泾等一众硕儒名士先后主讲紫阳书院，书院成了传播朱子学的重镇，“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朱子学也成为徽州学术思想的主流。

明中后期，因阳明心学的影响，占据徽州学术思想主流 300 年之久的朱子学呈式微之势。入清以后，程朱理学再次被倡导，重振朱子学的希望被点燃，杨泗祥、汪佑等新安理学家勤力宣扬朱子学，“务经明行修，宗尚周程张朱之学”的《紫阳讲堂会约》，“一本紫阳会规遗意”的《还古会约》等相继问世，朱子学回归徽州书院讲坛。直至乾隆时期，徽州学术迎来“破末世雷同附和之习”的创新契机，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新安朴学兴起，逐渐成为徽州学术的主流。

作为徽州学术文化的中心，紫阳书院在发展更迭中始终秉承守正创新的学术传统，与徽州学术兴衰相始相



终，保持其学脉不绝。

兴文重教

徽州紫阳书院虽因战乱校址屡有变迁，但始终坚持与徽州文化发展相依相伴，促进了徽州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

明末清初，推行课艺、应举的同时，紫阳书院不忘坚守学术传统，坚持“讲会与课艺并行、学术与功利并举”，制定《紫阳讲堂会约》《紫阳规约》等规章，构建了完整的讲学体系和严密的教育组织。紫阳书院的这种坚守和改变，不仅促进了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而且满足了徽州学人的入仕愿望，为徽州培养了大量人才。与此同时，紫阳书院还发展了刻书藏书事业，尤其是刻书业，至明清时期已甚为发达，《施闰章诗集》（康熙）、《程朱阙里志》（雍正）、《御选唐宋诗醇》（乾隆）、《诗经诂义》（光绪）等一批文献先后问世。以紫阳书院为代表的徽州书院刻书业影响广泛，推动徽州成为我国当时四大刻书中心之一，而紫阳书院刻书藏书在提升其祭祀、课艺与讲会品质之外，也增加了徽州地区的文化积累，丰富了徽州地区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徽州文化的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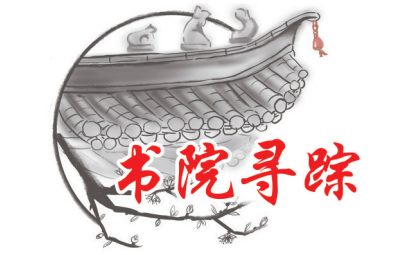
及繁荣。

紫阳书院以其助力徽州教育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赢得了地方的大力支持。书院数百年里经历数十次修建、扩建、复建，多数得到了地方官员的参与支持，一些官员甚至在退隐或卸任后参与书院的管理和地方教育文化事务。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明正德年间的两位徽州知府熊桂、张芹。熊桂知徽州府事期间，耗时两年对书院迁址扩建，是书院创建以来建制最完备、建造最美观的一次升级，使得书院面貌焕然一新。张芹任徽州知府期间，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建成紫阳山书院，实现书院于其山、称其名，成就紫阳山书院与紫阳书院“两院并兴”的佳话。

“万石家风惟孝悌，百年世业在诗书”。地方的积极参与，加上书院自身发展的推动，徽州地区兴学成风，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风气极为兴盛。

化育乡风

徽州紫阳书院扎根“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徽州大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传统，助力徽州地区崇学重教、尚俭尚文等民风的养成，也因此成就其独有的社会支持与地方



影像传播中的君子文化

□ 李 安

断实践，希望通过影像娱乐和大众传播的方式向观众呈现鲜活生动、多姿多彩的君子形象和君子文化。如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一代名相陈廷敬》中“公忠体国”“清廉孝悌”“为政以德”的廉吏于成龙、干臣陈廷敬。此外，《大宅门》《乔家大院》等剧中演绎的“君子喻于义”“和为贵，守中庸”的商业诚信精神，多角度展示了中国君子文化的不同侧面。

导演李安与张艺谋也均以巨制武侠大片的形势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君子文化的敬爱。李安在电影《卧虎藏龙》中，塑造了有着道家文化背景、儒侠一体的李慕白这个君子形象，片中李慕白传授给弟子玉娇龙的内功心法，暗合君子内敛之道。李慕白最终舍身成仁，以生命为代价感化了任性而为的玉娇龙。如果说，李慕白是“以德服人”，那么，张艺谋电影《英雄》中的刺秦义士无名、残剑等人却是为了“天下一统”而“止戈为武”，诠释了放弃个体复仇之念而心怀苍生的坚韧、隐忍的侠义君子形象。女导演胡玫以《孔子》为片名，讲述了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子路等人在礼崩乐坏的年代，匡扶天下、克己复礼的伟大实践和儒家理想，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何谓“仁义礼智信”，以及“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君子文化内涵。

借助“中国功夫”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日臻成熟，新

武侠电影近些年来在再生产和跨国输出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方面成就显著。其中电影《叶问》系列可以说是代表之作。以君子文化、君子人格、君子风度赋能的人物原型、片中塑造的一代宗师叶问形象的成功堪称影片最大亮点。不同于黄飞鸿、霍元甲等广为人知的武林豪杰，叶问鲜见于民间传说。他低调、谦和，爱好和平，但对来犯之敌绝不手软；他不持门户之见，深谙“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懂得求同存异；他虽有很强的民族情结和爱国之心，但却从不贬低或者仇视他国武术武道。在战胜英国拳王龙卷风后，叶问说，我不想证明中国拳法优于他国，我只是希望我们互相尊重。叶问对抗的不是外国人，他对抗的是种族主义者，目的是弘扬人间正气。身材弱小而武术精湛的叶问是集合了儒家传统美德、有着中西教育背景、深具君子器量的新武者形象。当种族歧视的美国士官被叶问击倒时，对方士兵也情不自禁为之鼓掌。叶问正是以其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君子风范和跨越族群的武德赢得了不同文明间的尊重。

互联网的发展开拓了影像传播和视听娱乐的新空间，改编自网络文学的两部电视剧《琅琊榜》和《鹤唳华亭》以架空历史的叙事策略和唯美风格，有效传达了独具意味而又契合时代精神的君子之美。这种美不在于流量明星的颜值之高，而在于他们秉持

君子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在于他们外仁内礼的君子操守与格调之美，在于剧中人物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的舍生取义、重情守信、慷慨悲歌。这种美还在于因精良制作而高度还原的儒家仪轨容止与东方器物服饰之美。在《鹤唳华亭》中，太傅卢世瑜为匡扶太子萧定权过失，以打手板的方式教导弟子“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凛然正气，萧定权处绝境之时恪守“君子死而冠不免”的从容决绝，生动阐释了“鹤性本君子，嘹唳通太清”的高古风姿。《琅琊榜》中，梅长苏在为太奶奶守孝时的至真、至忧、至孝的悲情色彩等情节也很好再现了君子性情的沉静肃穆之美。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君子这个概念早已成为华夏儿女的文化基因和理想人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标签。时代在发展，君子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吐故纳新，而君子文化与君子形象的文本生产，应与不断进步革新的媒介技术和融合传播手段相调适，不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代精神引入源头活水。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研究员）

